

国际经济热点译丛

全球性公司与 各国政府

**GLOBAL CORPOR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美]爱德华·M.格莱汉姆 著
Edward M. Graham
胡江云 赵书博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性公司与各国政府/(美)格莱汉姆(Graham, E. M.)著;胡江云,赵书博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

(国际经济热点译丛)

ISBN 7-200-04009-6

I. 全… II. ①格… ②胡… ③赵… III. ①跨国公司-研究 ②投资-政策-研究-世界 IV. F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49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1663

Global Corpor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国际经济热点译丛
全球性公司与各国政府**

QUANQIUXING GONGSI YU GEGUO ZHENGFU

[美]爱德华·M. 格莱汉姆 著

胡江云 赵书博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128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 000

ISBN 7 - 200 - 04009 - 6

F·247 定价:11.00 元

总 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梦奎

11/98/20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这是一个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也是一个大趋势。这两种发展趋势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说，日益密切的中外经济交往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发展机遇，也形成巨大压力。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角逐中成为赢家而避免成为输家，首先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家经济振兴是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前提或基础，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又是现阶段国家经济振兴的必要条件。

人们看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经济因为活力增强而得到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中国也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越广泛，越深刻。这种影响，不论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都是应该了解和研究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

借鉴，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可以少走，其他国家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可以参考，别人的思索可以启发我们的思索。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及时跟踪研究更是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甚至国内经济决策所必须的。商战犹如兵战，用得着一句现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翻译出版国外著作是了解世界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对于国外经济类著作的翻译出版日益增多，但大体上还是偏重于教科书和其他学术专著，关于当前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著作翻译出版尚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审时度势，独辟蹊径，组织翻译出版国际经济热点译丛，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的繁荣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对于这套译丛的编辑和出版有如下希望：

第一，选题紧密结合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力求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国际经济著作浩如烟海，学派可以兼及各家，地域不必局限一国，以便于读者从比较中决定取舍和得到借鉴。这需要编选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现实经济问题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于国际经济著作的宽广眼界。

第二，偏重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重大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著作。这些实际问题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某国某地所独有的。对于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意义，或者就是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开拓，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原著的体裁或者表达形式，尽可能通俗易懂和雅俗共赏。如是，则不仅可以满足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需要，更可以满足企业家和其他实际经济工作者的需要，满足关心经济问题的其他读者的需要。国外此类著作甚多，中国作者可以效法。

第四，既要及时，又要持久。关于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著

作时效性强，加之我国翻译出版周期过长，往往时过境迁，热点转移，读者寥寥。因此，从选题、翻译到出版，都要注重时效。这套译丛是关于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研究性著作，不同于经济问题的新闻报道，虽然每年只能翻译出版若干本，但持之以恒，积少成多，必然蔚为壮观，成为中国书林之一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愿出版社和译者共同努力于上述目标之实际，也希望得到学术界、翻译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参与。

1999年11月24日

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致中国读者

过去的 10 年，国际经济占据了这个时代舞台中心。世界遭受了三次主要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的守护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未能有效地应对危机而受到抨击。贸易谈判的进程，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获得的重大进展，仍是各类媒体的头条新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扩张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腐败通常吓跑了它们极其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阻碍着经济发展进程。世界经济中的主要问题连接起来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全球化——许多人视之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欢迎它，也有一些人认为它对环境有害并且导致工人失业而谴责它。这肯定是一个在今后许多年间有待人们研究的热点。

上述的问题都在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的范围之内。本所设在华盛顿，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的、无党派的思想库。作为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领导者，致力于预测将要出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充满活力的经济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和政策建议提供出来，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选择公共政策提供信息和建议。我们每年作为初步研究成果而出版的书大约有 15 种，

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化。我们很高兴能和中国的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熊贤良博士等学者一起工作，将本所的5部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并作为“国际经济热点译丛”的第一批著作出版。

金伯利·A. 艾略特 (Kimberly Ann Elliot) 主编的《腐败与全球经济》一书，探讨了腐败的原因、后果（包括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跨国公司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

温迪·多布森 (Wendy Dobson) 和皮埃尔·雅凯 (Pierre Jacquet) 所著《WTO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一书，讨论的是1997年12月结束的金融服务谈判，并且评价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其中包括一个对中国的案例研究。

爱德华·M. 格莱汉姆 (Edward M. Graham) 所著《全球性公司与各国政府》一书，分析了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国际投资问题的性质和内涵，包括这些问题对世界经济和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影响。

丹尼·罗德瑞克 (Dani Rodrik) 所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一书，全面地分析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收益和风险，并且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对其风险的低估。他指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一样，面临着从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中可能受损的危险。

巴瑞·易臣格瑞 (Berry Eichengreen) 所著《迈向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思考》一书，探讨的问题是日前人们普遍关心的：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制度安排不再能充分应付当今世界的高资本流动性。作者特别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改革该机构的可行性建议的框架。

我希望本所的研究及其他活动，能够在为全球的国际经济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方面作出贡献；而以不同的语言出版我们

的著作，无疑有助于将我们的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国际读者。我诚挚地邀请这些出版物的中国读者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C. Fred Bergste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1999 年 11 月

(作者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C.F. 伯格斯坦)

英文版序

国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多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已远远超过国际贸易，实际上国际贸易的大部分发生在这些国际企业之间。

但是与贸易相比，国外直接投资还远远未被人们完全理解。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的争论集中于国际投资是否是一件好事，以及政府与公司哪一个占主导地位。而且，没有全球规则或相关制度来管理国外直接投资，而贸易问题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货币问题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开发融资是通过世界银行解决。

本书试图填补两个空白。在分析层次上提出两个日益增长的冲突：各国政府和向全球发展的企业追求不同的目标，他们之间产生冲突；不同的政府之间互相竞争以获取国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因此也出现冲突。在政策层次上，本书回顾以前的国际协议，并且提出一个新制度，以便有助于解决更大范围内的新型问题。

国际经济学学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私人机构，它研究和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其目的是分析该领域中出现的重要问题，研究和结合实际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学会完全是非党派的。

学会主要是由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现在学会接受的机构赠予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杰曼·马歇尔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安德鲁·梅隆基金会和 C.V. 斯塔尔基金会。其中，马歇尔基金会

于 1981 年提供巨大的赞助，建立了学会。大量其他基金会和私人公司也成为学会资金来源的渠道。通用电气基金为本研究提供了支持。1995 年财政年度中的学会资金来源大约 16% 是由美国以外的捐赠者提供的，其中大约 7% 来自于日本。

董事会对基金会负有全面责任，并对其研究方案进行综合指导和批准，包括鉴别课题，该课题在中长期内（通常 1~3 年）可能对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者很重要，以及哪些应由学会提出。董事长与全体员工以及外面的咨询委员会一起密切工作，他负责特定项目的开发，并最后决定出版个人研究成果。

学会希望其研究和其他活动有助于为制定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政策打下较强的基础。我们恳请这些出版物的读者让我们知道：对于我们尽力完成的目标，他们是如何想的。

C. 弗雷德·伯格斯坦

1996 年 4 月

致 谢

尽管这本书并不厚，但是它的酝酿期却很长。作者与许多人进行讨论并从中受益，远比这里所感谢的人要多。不管怎么说，特别要感谢那些仔细审阅本书倒数第二稿的人们：C. 弗雷德·伯格斯滕、约翰·H. 邓宁、西尔维娅·奥斯特里、雷蒙德·弗农、玛丽娜·惠特曼和 N. 惠特曼以及道格拉斯·沃思。其他一些人提供了大量帮助或进行有价值的批评，包括威廉·巴雷达、托马斯·布鲁尔、史蒂文·坎纳、杰弗里·卡利那、丹尼斯·恩卡纳西翁、马克·梅森、卡尔·格林、史蒂芬·吉森格尔、J. 戴维·理查森、皮埃尔·索韦和杰弗里·J. 肖特。为此书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帮助的有：安西直子、林华明、阿龙·塔姆、马克·沃纳和张智。作者也与加拿大贸易工业部的许多人员进行讨论，并从中受益，这里没有向他们致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敏感。当然，上面所提到的人员都不为此书中出现的事实错误或判断错误负责，作者个人为本书承担责任。

目 录

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致中国读者 (1)

英文版序 (1)

致谢 (1)

1 绪论 (1)

2 全球化经营的新趋势 (9)

 国外直接投资和贸易 (14)

 国外直接投资和研究与开发 (16)

 国家间的比较 (17)

 国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变化 (21)

 国外直接投资流动方式的预测 (25)

 全球化的历史展望 (27)

 地区主义和全球性公司 (34)

3 企业为什么全球经营 (38)

 什么是全球企业 (38)

 国家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 (47)

 政府和全球性公司冲突的隐含意义 (52)

4 国际投资的新规则 (54)

 国外直接投资协议 (55)

 辅助法规 (70)

 结论 (76)

5 二战后制定规则的努力 (77)

建立国外直接投资规则的多边努力·····	(78)
解决国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方法·····	(90)
双边条约·····	(99)
主要母国和东道国的立场变化·····	(100)
结论·····	(115)
6 投资协议的谈判和履行·····	(116)
寻找合适的论坛·····	(116)
世界贸易组织·····	(11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20)
其他区域安排·····	(133)
我们走向哪里·····	(135)
结论·····	(137)
附录·····	(139)
发展中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溢出效应·····	(139)
制裁的博弈理论方法·····	(149)
缩略语英汉对照表·····	(153)

在 1986—1996 年的 10 年里，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巨大浪潮在历史上最大限度地加快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国外直接投资是世界全部固定资本构成的一部分，它增长了近 80%。现在国外直接投资占美国和欧洲整个资本构成的 5%~6%，占中国的比例达到令人吃惊的 20%。^①

但是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为世界经济提供资本。假如允许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则大型多国企业的国外经营通过技术转让、引进新的和更好的管理技术以及加强竞争，有利于改变其所在经营国的经济状况。

最近的国外直接投资浪潮已迫使许多政府重新调整对国外直接投资和全球性公司的政策和态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企业长期以来受到怀疑。在许多国家中，这些企业面临如下指责：剥削本地经济而使企业的母国受益，以及造成东道国对国外资本的不健康依赖。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里，国外直接

^① 更为准确地说，国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国外资本净流入使国外直接投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增加来作出贡献的。因为根据国民收入等式 $I = S + NCF$ ，这里 I 是国内总投资， S 是国内总储蓄， NCF 为国外资本净流入（如果是资本净流出，则 NCF 为负值）。又因为国外直接投资是国外净资本流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国外直接投资对 I 的贡献比例与国外直接投资对 $S + NCF$ 的贡献比例是相同的。国外直接投资最好被视为国内实际投资的一个融资来源，而不是一个实际的组成部分。

投资和全球性公司对许多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最明显的例子是总人口几乎处于两极的中国和新加坡）。这些积极的贡献表现在其对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率和生活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从这种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各国政府和全球性公司之间的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迫切需要制定全球性公司的国际投资和其全球经营的新规则。

这些规则应该主要地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对国外直接投资政策自由的趋势，以抵消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的较严厉的干预主义政策。当采取自由政策（即限制最小）时，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的全球利益以及对个别国家增加的利益都是最大化的。因此，需要制定国际新规则的一个原因是维护已有的自由政策和继续推行它。但是，即使面对这种自由化趋势，仍有政府制定扭曲国际投资流动及由此形成的商业活动的法律和政策。这种扭曲以减少产出的形式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主要成本。因此，建立新规则的第二个原因是消除这种扭曲行为来获取重大的潜在收益。第三个原因是减少关于国外直接投资方面政府与多国企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也能降低从国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净增加收益。

管理投资的国际新规则应建立在四个前提之上：全球化正在增加，全球企业面临各国政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全球企业和政府的目标都是合法的。

(1) 从经营范围和特征来看，全球性公司的数量迅速增加，遍布全球。显然，国际化经营不再是一个新鲜事物（见第 2 章的国际化经营的一些历史）。史无前例的国外直接投资浪潮大约是从 10 年前的 1986 年开始的，并持续至今。结果是公司扩展了在全球范围的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状况，但其意义尚未被充分理解。

全球化规模是如何巨大呢？第2章详细给出显著的事实和数据。然而，作为一种介绍方式，让我们注意在1993年全世界国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世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的4.1%，^①在1981—1985年，这个比例是2.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5》，附表5）。这个比例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993年美国国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为5.1%，欧盟为5.8%，东亚为9.1%，中国为20%，新加坡为令人难以置信的43%（然而，该国有些特殊情况，整个国家是一个单一城市）。但对于渴望资本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个比例仅为3.3%，对于这样的一些国家，这个比例更低（例如，肯尼亚仅为0.2%）。

关于这些数据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国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世界上最大的且最具有技术动力的企业进行；第二，这些企业的国外投资并不代表其所有的直接投资，典型地他们也在其母国投资（这样，差不多可以肯定全球数字低估了这些企业在全球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这是下面一章讨论的一个主题）。

（2）尽管全球化经营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10年，但是全球性公司经营仍面临着世界经济不完全一体化的状况，而且在政治制度中，各国为了追求自身必要的利益，制定了管制和其他政策。这些包括保护国家货币（和汇率及贸易平衡）的政策、国际生产中不易流动要素的政策（最明显的是非技术熟练工人和部分土地）和国家安全政策。而且，许多政府关心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如何提高其竞争力。

^① 国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为2220亿美元，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53510亿美元。

国家优先权及目标并不一定与企业的相一致。因此，在许多国家中有一个重要的争论：政策多大程度上可以确保全球企业符合国家优先权及目标。但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政策可以有效地使一国单方面从全球企业活动中获取的利益最大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它们可能不是最优的。的确，这样的政策可能产生“以邻为壑”的效应，于是利益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同样，如果所有国家都同时实行这样的政策，则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世界经济效率及福利的净降低。^①最后，从全球企业角度来看，这些政策可能不是最优的，因为全球企业努力使其全球活动合理化。

这里需要国际新规则的一个原因是：限制“以邻为壑”政策，因为它造成共同的自我打败。政府已在其贸易政策中接受限制，正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表述的，人们已经很好地理解这些令人满意的限制。本研究将建立与之相似的案例，用于规范国外直接投资政策。

（3）政府间及政府与企业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导致无效率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降低世界和国家福利。潜在的冲突不仅仅限于东道国和全球企业之间。母国也可能采取政策，确保以母国为基地的企业满足本国目标（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失败的伯克—哈特基法案为典型代表；相似的政策在其他国家已有讨论，这些国家是国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包括法国和日本）。这些政策与东道国的政策一样引发潜在的无效率和（或者）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废除这些不当政策会产生非常大的潜在利益。1992 年，多国公司国外关联企业的销售额估计达 5.2 万亿美元左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1995》，表 I .13）。这

① 在经济学的正式说法中，称其结果为“帕累托次优”。